

邱震海系列

特邀嘉宾张燕生



2020 大布局

你的机遇在哪里？

邱震海 ◎ 著

中国经济“弯道超车”、消费升级、人工智能来袭

你会遭遇风险，还是能抓住机遇？

趁科技改变你之前，
你需要了解未来将发生什么

著名学者邱震海对谈张燕生
经济与科技的激辩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邱震海系列

2020 大布局

你的机遇在哪里？

邱震海◎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20 大布局 / 邱震海 著.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8. 4

ISBN 978-7-5060-9960-8

I. ①2… II. ①邱…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发展—研究 IV. ①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84234 号

2020 大布局

(2020 DA BUJU)

作 者: 邱震海

责任编辑: 袁 园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 113 号

邮 编: 100007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26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9960-8

定 价: 49.80 元

发行电话: (010)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请拨打电话: (010) 85924602 85924603

序 言

新时代：中国将对人类有更大的贡献

当我打开电脑准备撰写这篇序言的时候，正好是2017年10月下旬的一个清晨。

此刻，静谧的书房窗外传来阵阵鸟鸣，一缕阳光迫不及待地隔着窗户挤进房间。这一切似乎都在急切地告诉人们，虽然已是深秋，但大地依然充满着勃勃生机。

此刻，中共十九大刚刚结束，中国正式进入了新时代。近70年的共和国历史，从“站起来”“富起来”，到现在进入了“强起来”的时代。

在这个“强起来”的时代里，从现在开始到2020年前后，将是非常关键的一段时间。2020年前后的目标实现了，后面的“两个15年”的宏伟规划才有基础，21世纪中叶中国才能真正成为现代化强国。

在2020年之前的这几年里，无论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是正在迅速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最新科技革命，都将再经历一场脱胎换骨式的革命，而这最终将深刻影响我们每个人的财富、每个企业的订单、我们当中很多人的工作位置，还有许多人的职业或事业转型。

此时此刻，你准备好了吗？

你有没有发现，这一轮人工智能的大潮来势之凶猛，已远远超过过去5年移动互联网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因为移动互联网带来的主要是便利，其特征是便捷+甜蜜；而人工智能则在带来便利的同时，将导致很多人职业转型，其特征是便捷+痛楚。未来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将感

受到这一“便捷+痛楚”。

你有没有发现，中国经济这一两年开始复苏，一大批年轻消费者的消费需求迅速升级，被学者们称为“消费大爆炸”的时代即将来临；但我们的制造业还大都停留在“制造便宜货”的阶段。因此，一方面是许多企业转型艰难；另一方面消费者则路远迢迢地跑到国外去“买买买”。

如果说，上面这两个现象，前者涉及可能受人工智能威胁的一些岗位和人士，后者主要涉及企业家，那么下面的这个问题就更加困扰每个人，那就是两个字：创新。

谁都知道，创新的时代已经来临。本书的对话将提出一个核心观点：2012年前，谁创新谁死；2012年后，谁不创新谁死。但是，究竟如何创新？什么样的事情才能被称为创新？我们会创新吗？中国目前的创新状况究竟如何？

最重要的是，谈创新，首先是思维模式的创新；如果不改变我们现有的思维模式，那么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就是你，或者是我？

讲一个故事吧，你一下子就会明白。哥伦布当年发现新大陆后，受到许多人的刁难。有人给他出了一个难题：在没有任何东西的桌子上，把一个鸡蛋竖起来。面对这明显的刁难，哥伦布略一思索，把鸡蛋在桌上一击，蛋黄流了出来，但鸡蛋竖起来了。后来，西方的一些语言中就有了“哥伦布的鸡蛋”这一说法，借以表示突破常规的思维方法。

未来几年，你我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哥伦布的鸡蛋”。

所有的这些，你可以在本书后面的章节里慢慢阅读、体会。

但这些后面可以阅读的内容，却不是我在这篇序言里要讨论的重点。

这篇序言的重点是：既然谈到了中国经济和国际科技大趋势，那么以国际和历史的视野，从理论上梳理一下中国曾经走过的，以及未来将要继续走的道路，显然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只是，下面的这篇长文可能略显枯燥，因它涉及对人类过去250年科技、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整体思考。

如果你只是对未来几年可能影响你实际生活的经济和科技趋势感兴趣，建议你可以跳过下面的文字，直接阅读本书后面的章节。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愿意将正在影响你生活的经济和科技趋势，放在历史和国际的维度下做一些更为深入的思考，以使你的人生过得更为通透，那么花一点时间阅读本文，也许不是一件浪费时间的事情。

还是从我们身边的事情说起吧。

仅仅5年：中国经济何以焕然一新？

此刻，在我脑中出现的，是我在前几本书里写过的几个故事。

我在2015年出版的《迫在眉睫：中国周边危机的内幕与突变》一书的序言里，曾记述过古城西安一位中年女白领对我说的话：“邱老师，你别讲那些高深的理论，你就实实在在地告诉我，我手里的那几套房子，最近到底是卖还是不卖？”接着她又说：“还有，我如果把手里那几套房子卖了，你得告诉我，2015年有没有新的投资渠道，让我至少能保值？”

她说这话的时候，是2014年的深秋，距今整整3年。

我在书里评论这个故事的时候这样写道：“2015年即将开始的时候，大多数的老百姓担心，中国的经济是否会出现断崖式的风险。”

再往前，我在2014年出版的《当务之急：2014—2017年中国的最大风险》一书里，曾记述过地产大亨潘石屹与地产评论家牛刀的对话，时间是2011年房地产调控最严厉的时候。

牛刀，作为一个对地产调控充满期待的评论家，当时曾预言“2012年中国楼市将崩盘”。那时的潘石屹，自称具有“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说话总是小心翼翼，但还是说出了当时的房地产市场的一些实情：“我想给牛刀说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今天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和十多年前海南岛的房地产市场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时海南岛的房地产市场基本没有最终的需求，全是草炒草建。而今天我们看到北京、上海的需求，北京房租上涨的幅度很快，这就是最真实的需求。”

几年过去了，当我们今天再回首当年的这些场景时，发现很多情况已时过境迁了。

今天的中国民间，恐怕没有几个人还会担心中国经济会出现断崖式下跌的风险。无论是从2017年第一季度开始的经济数据，还是散落在民间的信心，似乎都证明了这一点。

从2017年第一季度开始，中国经济不但出现回暖，甚至出现了我称之为“未触底已反弹”的现象。从2011年开始，我就与一些经济学家一直在跟踪、研究中国经济下行的趋势。“2017—2018年中国触底”，是过去几年里各路经济学家似乎比较一致的共识。

但时至今日，这些预测似乎一个都没有应验。相反，最近几年里，人们看到的是：

- 中国经济开始企稳，而且2017年的全年经济增速有望维持在6.9%以上，这一点与2012—2014年人们的担忧相比，完全呈天壤之别。

- 2014年的时候，有朋友告诉我，以后出门可以不带钱包，我还以为这是玩笑之言。但这几年，“不怕钱包没钱，就怕手机没电”在中国大陆真正成为日趋普及的现实。从美国、欧洲、东南亚、中国港澳台地区再回到中国大陆，没有人会否认，移动支付以及以移动支付为代表的新一代移动互联网，在中国大陆发展得最为兴旺。

- 与移动互联网发展几乎同时在中国兴起的，是这几年在中国年轻人中方兴未艾的创业浪潮。大家可能都还记得，2012年之前，中国年轻人几乎清一色的以报考公务员为自己的择业趋向。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报考公务员在年轻人中已悄悄地为另一种趋势所替代，那就是创业。2015年上半年，国务院提出了双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但其实，年轻人的创业之风在2014年就已悄然吹起。

既然谈到了2014年，那就来谈谈2014年这一年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2014年，中国经济发生了两件外人并不一定知晓的事情：一是中国资本对外投资的总量，首次超越中国引进外资的总量；二是中国首次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伙伴国。这其中，前一条消息尤其值得重视。

也许你会问：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对此，只要简单回顾一下过去3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就可看得很清楚。

在改革开放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吸引外资曾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由此招商引资也成为各级政府官员的业绩目标之一。这后面的背景不言自明：当时的中国极其需要外部资金和技术。

但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资本对外投资日益成为趋势，并在2014年首次超越引进外资的数量。几乎就是从2014年开始，世界各地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收购西方品牌的中国企业家，就连德国最大的机器人制造公司，也被中国的企业家买下。

这个细微而不引人注意的现象，其实正是从一个侧面折射了中国正在“强起来”，而这将改变中国与世界的方方面面的关系。

除此之外，只要回顾一下过去几年你身边的现象就可发现，2014年是改变你我生活形态的关键一年。

2014年之前，你我的生活形态几乎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

- 从2014年开始，我们开始尝试用手机付钱、用手机约车。
- 从2014年前后开始，我们几乎不看电视了，而这之前每天晚上打开电视机是我们的日常习惯。
- 2014年之前，我们的工作联系还主要是通过打电话，但从2014年之后我们则更多地使用微信和微信群组来工作，一天也用不了一次电话在今天成为常态。

请注意：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这些重大变化和进步，恰恰就出现在被我们称为经济下行的那几年里。

从2014年到2016年，人们发现，一些过去若干年里长期得不到有

效治理的经济顽症，开始得到整治并初见成效，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房地产市场。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如一锤定音，给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整治定了方向。2016—2017年，一系列房地产长效机制出台。经过一年的发酵，2017年“十月黄金周”里，第一次出现了看房人流大幅减少的冷清现象。

前文提到2011年我邀请潘石屹和牛刀进行的对话。这么多年过去了，中国的楼市始终没有崩盘，而上面提到的“中国楼市崩盘论”却早已“崩盘”。而那边厢，据坊间传闻，某房地产大佬则正以大手笔出售资产……

与此同时，一个“消费大爆炸”的年代似乎正在向中国走来。前几年，当我们忐忑不安地担心中国经济下滑时，中国的人均GDP却仍以加速度增长，以至于出现了“经济下行，财富增长”的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

以消费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是过去20年里多少学者和官员的雄心和梦想，只可惜都未能真正实现。只有到了2017年年尾的时候，人们才发现：这个时代真的来临了！

2007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德国，成为“世界老三”。

2008年，也就是举办北京奥运会的那一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这一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从而开启了本书后面称之为“享受型消费”的时代。

2010年，也就是举办上海世博会的那一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越日本，成为“世界老二”，那一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4200美元。

2011年，中国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

2014年，如前所述，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中国资本对外投资首次超越吸引外资的总额，那一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7594美元。

2016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7900美元。按照这一年开始的“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中国的人均GDP将达到12000美元。

虽然这一步距离美国的54000美元和德国的48000美元还相去甚远，但全世界恐怕没有人不为中国的这一速度而惊讶。

2017年夏天，英国《金融时报》敏锐注意到，中国消费者在海外的消费习惯，已从以前单纯的“买买买”转型到了“体验型消费”。

“消费大爆炸”时代的来临，正在带动中国各个产业的升级换代。

今天的中国，如果你从南到北对企业转型做一番调查就会发现，各地的企业转型各有千秋，有时几乎处于完全不同的时代。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赶上方兴未艾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潮流，以智能化的工艺改进其自身的生产和工艺流程；凡是已经踏上转型之路的企业，无不显得信心满满，而这样的企业在今天的中国正越来越多……

这个时候，自然也不能不谈中国的创新。

谈到创新，这曾经是中国多少年的一个痛。“自四大发明之后，中国就没有给过世界更多的贡献”，这曾经是多少人对中国的责难，也确实曾使我们感到无地自容。

但几乎也是从2014年前后开始，这一切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如前所述，几乎是2014年前后，中国在引进移动互联网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请注意，我这里使用的是“引进”二字，因为那时中国对移动互联网的使用，更多的仍是引进别人的核心技术，使之在中国的大地上开花结果。

但这几年，更准确地说是最近的一两年，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正在积聚能量。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在人工智能这个决定这一轮科技革命方向的领域里，中国与美国几乎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第一个回合可能就将在2020年前后决出胜负。

今天的中国，似乎正处于厚积薄发的新起点上。将近40年的改革开放，在为中国积累了巨大财富的同时，也使这个民族的内在创造力正

在呈井喷式的增长和爆发状态。

写到这里，一系列更为深层的问题渐次浮出：

- 导致中国潜力厚积薄发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 在所有这些转型、升级、厚积薄发的进程中，中国不是没有面临过风险，但几乎每一次都能化险为夷，同时取得更为长足的进步，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提出这些问题其实并非空穴来风。就以我正在撰写这篇序言的2017年而言，在过去的30年里，凡是遇到逢7的年份几乎都是世界金融市场的噩梦之年：

- 1987年10月19日，华尔街爆发了著名的“黑色星期一”，以至于30年后的今天，华尔街的许多人对此依然谈虎色变；

- 1997年下半年，从泰国开始继而蔓延整个亚洲，亚洲金融危机曾使多少人一夜赤贫；

- 2007年下半年，美国金融市场正在进入“崩溃前的最后疯狂”……

这几年：西方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当你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时间已经进入2018年，距离由美国开始的世界性金融危机，正好整整10年。

10年后的今天，虽然西方各国的经济不同程度地进入了复苏轨道，但必须承认，世界经济从整体上说，还没有从10年前的那场危机中恢复过来。低增长率、低投资率、低贸易量、低利率、低物价等，就像依附在世界经济复苏轨道上的“魔鬼”，使世界经济复苏这趟列车始终步履艰难。

这几年，西方世界出现了越来越多让人看不明白的东西：美国的

“特朗普现象”、英国“脱欧”、欧洲集体右滑、民粹主义盛行、恐怖袭击更为猖獗……所有这些现象，孤立地看似乎都有其各自国家的国情背景，但若放在一起看，一定是折射了西方世界内部出现的一些共同的规律性的问题。

所有这一切，是过去250年世界市场经济（或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规律中极少见到的现象。

曾记得，自从18世纪60年代人类进入第一次科技革命，科技革命就持续不断地推动着当时刚刚兴起的资本主义，使其在后来的250多年时间里，成为人类几乎唯一能在最短时间内创造最大财富的一种经济体制。但持续不断的经济危机也始终与资本主义体制如影随形。不同的是：在过去250年时间里，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始终周而复始，似乎具有强大的自愈能力，甚至包括1929年的那场经济危机。

但这一次的情况却显然不同：2008年以来的10年里，资本主义体制的自我修复能力似乎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它不但体现在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上，而且还体现在如上所述的一连串社会情绪和政治动荡上……

这个时候，简单回顾历史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1918年一战结束，世界进入“潘多拉盒子被打开”的20年动荡期；1929年，美国爆发经济危机，继而蔓延全世界，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无论是经济学还是历史学的研究都已证明，在所有的这些历史事件之间，存在着相当严密的逻辑联系。

再把眼光拉回到当代。谁都知道，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起源于华尔街银行家们的“金融创新”，亦即创新过度，监管缺位。此后，美国严格加强了金融监管。但将近10年后我们发现，特朗普上台后，在“让美国更伟大”的旗号下，美国又在大力放松金融监管，10年前的那一幕，像一连串阴影，在我们的眼前晃动……

资本主义到底怎么了？

这是过去10年里，许多西方学者（其中包括经济学家、社会学家、

政治学家)和思想家不断提出的问题和做出的思考。

但10年来,几乎所有的西方学者和思想家都无法否认(不管他们是否愿意)的一个事实,就是国家的力量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需要被重新审视和界定。

谁也无法否认的一个事实是: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如果没有世界各国政府的共同介入和干预,后果可能不堪设想。就连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20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第一次会议就是2008年11月8日在华盛顿举行的,其直接成因就是当时各国政府的救市行动。

了解西方经济史的人都知道,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始终是西方经济学的争论焦点之一。以20世纪为例,主张政府介入的凯恩斯和主张市场至上的哈耶克,几乎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两大主要流派,其主张各有利弊。在德国,市场经济被称为“社会市场经济”,尤其强调和重新定义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即所谓“(国家)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少干预,在必要的情况下尽量多干预”(So wenig Staat wie moeglich, so viel Staat wie noetig)。

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古典自由主义几乎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其主要表现就是美国的里根主义和英国的撒切尔主义,主张市场力量至上,并实行大幅私有化以提高竞争力。20世纪90年代,我正在德国求学,亲眼所见当时欧洲一些国家的铁路等国营机构都被大幅实行私有化。

那个年代的西方,刚刚承接了20世纪80年代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经济学带来的繁荣,又正处于冷战结束的狂热之中,因此也正是所谓的新古典自由主义大行其道之时。当时,即便在西方,几乎没有人质疑过这一经济发展方向。一直到2008年,由于包括新古典自由主义在内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导致了深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许多人才如梦初醒。

但此时为时已晚,因为过去250年的资本主义虽历经不同的科技和经济发展水平,但其本质似乎一点都没有改变。

2017年9月,是马克思《资本论》诞生150周年。早在2008年美

国金融危机爆发时，就有人提出“重读马克思”和“重读《资本论》”，因为虽然时代不同、科技发展水平不同，但现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在马克思当年的著作中被揭示得十分清晰，而恰恰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本质直接导致了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

曾误导过我们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究竟是什么？

但是，讨论西方的危机不是我撰写本文的主要目的。我想指出的是，某些曾导致西方产生危机的思想，过去若干年恰恰深深地误导过中国经济的发展。这就是我在下面马上就要谈到的新古典自由主义。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今天相当一部分经济上出现的问题，都可以归结到新古典自由主义的误导。

读到这里，也许你会吃惊。别急，我在本文后面马上就会谈到这一点。这里，有必要先简单谈一下，新古典自由主义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这里的背景是：在中文的语境中，新自由主义是个被广泛错用的概念；很多人狂批新自由主义，但岂不知他们批评的对象其实是新古典自由主义。

今天很多人嘴里所说的新自由主义，严格说来是西方经济学里的新古典自由主义，英文表达是 Neoliberalism，德文有时干脆就用 Neoklassiker（新古典主义）来予以形容。它是英国现代政治思想的主要派别，成形于20世纪70年代，成熟于80年代，主张在新的历史时期维护个人自由，调解社会矛盾，维护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因而成为一种经济自由主义的复苏形式，近40年来在国际的经济政策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既然被称为新古典自由主义，那么在它的倡导者看来，就是对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回归。读过或听过《国富论》的人都知道，亚当·斯密主张经济上放任自由，发挥市场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在新古典自由主义看来，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后来被人

歪曲了，“市场之手”被人束缚住了，因此亟须在经济政策上重归亚当·斯密。

确实，在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和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新古典自由主义之间，还有一个被称为 New Liberalism 的经济学思潮，直译过来才是新自由主义。

这个思潮在19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存活了整整100年。19世纪70年代，英国经济危机严重，为适应新的政治要求，T. H. 格林首先提出了既坚持英国自由主义传统，又实施国家干预，充分发挥国家作用的新理论。这个理论被称为 New Liberalism。与亚当·斯密不同，New Liberalism 提出自由应该是制度框架内的自由，而不是放任自流。

由此可见，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整整100年的新自由主义，其实是强调国家力量对市场力量的平衡，也是对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的适度修正。从2008年经济危机整整10年后的世界经济情况来看，这反而是一种值得推崇的稳健做法。

在新自由主义 (New Liberalism) 存活整整100年的时间里，还产生了主张国家积极干预的凯恩斯主义以及德国的社会经济。凯恩斯主义、德国社会经济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究竟存在多少思想资源上的联系或遗传？这是一个学术问题，不在这里讨论之列。但可以肯定的是，新自由主义倡导国家力量对市场力量的平衡，这不但具有积极、正面的意义，而且在二战后30年（1949—1979年）对西方经济的“大繁荣时代”做出了贡献，包括福利国家的完善与成熟。

但20世纪70年代，随着福利国家在欧洲遇到艰难，尔后的石油危机、连串经济危机又导致西方经济出现动荡，新自由主义逐渐式微。此时以哈耶克为首的学者逐渐兴起，并提出以回复古典自由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新古典自由主义 (Neoliberalism)，主张再次强化市场力量，让国家力量淡出。

请大家注意新古典自由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

哈耶克理论与凯恩斯理论的格格不入，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出现，两者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但哈耶克的理论受到美国和英国的重视，却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其直接支持者和体现者就是美国的里根政府和英国的撒切尔政府，即后来的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以大幅市场化和私有化来推动经济发展）。

20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末，西方世界经历了二战后的30年“大繁荣”。70年代末，这个“大繁荣”走到了尽头。其时，也是全球化开始产生的年代，同时更是互联网正在酝酿并即将横空出世的年代，世界从此进入了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时代，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在政治上，80年代开始，世界进入了自由民主大潮，10年后直接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

因此，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世界进入20世纪最后20年的时候，人类历史无论从科技、经济还是政治，都进入了一个崭新和特殊的阶段。因此，新古典自由主义就是在这个时候诞生并对西方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

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对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是不争的事实。冷战结束后，新古典自由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大行其道，继而形成“华盛顿共识”，但也终于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中受到挑战。

如前所述，过去30多年里对中国造成重大影响甚至误导的，主要是新古典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亦即主张以全盘市场化推动经济发展，强调国家力量全方位淡出。但中文世界把它称为新自由主义，可能是翻译时望文生义，也可能是照顾中文读者对“自由”二字的或爱或恨的感受，单刀直入，简单粗暴。岂不知曾存活100年，并产生过凯恩斯主义和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New Liberalism，今天看来才是更有积极意义的。

中国经济：告别新古典自由主义的时间到了

读到这里，也许你已快睡着了吧？

如果你觉得上面这段文字太枯燥，可以直接跳过而读下面一段。如果你觉得尚有学术和思想价值，可以留着以后慢慢阅读和品味。

但我在这里的任务，不是以一大堆枯燥的西方经济学名词让大家昏昏欲睡，而是让大家尽快明白：西方经济学里的这些流派，与中国究竟有些什么关系？或者更准确地说，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过去的 30 多年里，曾经如何影响过中国，又对中国造成哪些伤害？

正在阅读本文的你一定了解，房地产、医疗和教育在中国是三件令人头疼的事情，房价高企、医疗和教育费用昂贵，曾经被称为“新三座大山”。

但你知道这“新三座大山”是哪里来的吗？

答案很简单：它们来自 20 世纪 90 年代的某个时候，我们以为市场化就是灵丹妙药，一股脑儿将住房、医疗和教育全面推向市场。

但当时，我们忘记了根本的一点，那就是：无论是住房，还是医疗和教育，它们既是商品，同时更是公共服务产品。作为商品，它们必须具有价格和价值，过去计划经济年代的几乎免费住房、医疗和教育自然难以为继；但作为公共服务产品，它们又必须以服务全社会绝大多数人为目的。

一个健康、稳健、安全、祥和的社会，必须达到这么一种境界：这个社会的所有人，不管是穷是富，不管有病还是健康，甚至不管能力大小，都必须获得与其尊严底线相符合的住房、医疗和教育。当然，这个社会依然是市场经济，因此住房可有大小之分，医疗和教育的程度与水准也可有一定差异，但作为社会公共服务产品，它们必须符合人的最低的尊严底线。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的住房、医疗和教育市场化，显然严重偏离了这一境界，而其根源恰恰就是 20 世纪 80 年代风靡西方世界的新古典